

打破經濟全球化的迷思：重新回到政治

宋興洲*

摘要

經濟全球化似乎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但經濟全球化並未意味著放棄地方或政治。本文的目的是在強調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換言之，「沒有經濟這樣的東西，只有政治經濟」。本文總共分為七小節：首先是前言；其次，辨別全球化的意義及相關概念；第三節討論世界金融市場是否已經發展完善並達到完全自我調節的地步，即經濟學所說的「巴瑞圖最佳境界」；第四節分析「新」經濟的意義及其來臨的可能性；第五節試圖釐清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不可分離性；第六節則探討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最後提出結論。

關鍵字：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政治、金融市場、新經濟、國家

* 私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論文經匿名審查通過，同意予以刊載。

一、前言

如果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是一九八〇年代流行的說詞，那麼一九九〇年代的主流意識及概念便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 了。除了這個口號喊得滿天嘎響外，許多書名如「民族國家的終結」(1996)、「虛擬國家」(2000)、「無疆界市場」(1997)、「全球化」(2000)、「經濟全球化」(2000) 等顯示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出版更是琳瑯滿目。事實上，“global”這個字的出現已經超過四百年，但“globalization”、“globalize”、“globalizing”等相關字眼則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才成爲一般用語(雖然當時有人覺得該字令人茫然)，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或中期，西方學界才承認全球化概念在學術上的重要性(華特斯，2000: 2)。同時，實際上的變化(尤其是經濟方面)更是驚人。例如，海外直接投資(不包括有價證券 portfolio)，以國內總生產毛額(GDP)來計算，比二十年前要大二點五倍，而在開發中國家則幾乎增加了四倍。貿易雖然並不如外國投資來得那麼快速，但也有成長。至於金融全球化可以說是成長最快的：與全世界的 GDP 相比，外匯交易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七年則成長了十倍，而且跨國銀行的信用及資產交易，以世界 GDP 的百分比計算，則增加了兩倍(Guillén, 2001: 238)。

如果全球化，尤其是經濟上全球化，如此勢不可擋，那麼我們應如何看待及對應？這個問題固然重要，而且討論起來不見得容易、簡單。不過，本文從另外一個方向出發，那就是，探討經濟全球化的根本意義，並澄清可能存有的錯覺和假象——我們不應純粹從經濟的角度著眼，而是把政治放在思考的邏輯中。以下是本文討論的順序：第二節辨別全球化的意義及相關概念；第三節討論世界金融市場是否已經發展完善並達到完全自我調節的地步，即經濟學所說的「巴瑞圖最佳境界」(Pareto Optimality)；第四節分析「新」經濟的意義及其來臨的可能性；第五節試圖釐清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不可分離性；第六節則探討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最後提出結論。

二、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可以說是近年來最被廣泛使用（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關鍵字了¹。不過，它也是最常被誤解，引發不斷爭議，處處顯得模糊，而缺乏明確的定義²。簡單而言，根據英國學者賀德等人（Held et al., 1999: 2, 14）的看法，全球化指的是，當代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包括文化、犯罪、金融、宗教精神等），在整個世界的相互連繫（worldwide interconnectedness）上，已經日益擴張、深入和加速。這種簡單性的說法又涵蓋了其他幾項概念：互相依賴（的加速性），遠距離行動（的可行性），及時間與空間（的壓縮性）。把這些特性（或概念）總括起來，全球化可以視為「一種過程（或一系列過程），具體表現出（就廣泛性、強化性、加速性和影響性而言）空間性組織在社會關係和交往（易）方面的轉變，因而活動、互動和權力運用，已顯現在跨越洲際或橫跨區域的流動和網絡中」（Held et al., 1999: 16）。所謂流動（flow），指的是物質、產品、人民、符號、象徵及資訊在時間與空間點的跨越與轉移，而網絡（networks）則是獨立單位（機構）、活動環節（nodes）、和權力展現（sites），形成有規律或模式的互動（regularized or patterned interactions）。

上述這種拗口的定義，不但抽象、不易掌握，而且牽涉層面複雜，很難用簡短的方式予以澄清。就現象而言，二次大戰後，通訊和運輸的基礎結構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與進步，團體、組織（制度）、和國家以新的方式互相連結。有更多的人到遙遠的地區，甚至世界各地，旅遊或移民；衛星廣播將世界的新聞和事件傳送給更多的聽眾和觀眾；網際網路更是將使用者編織在一起，互通訊息、傳達意見和彼此交流。這些連繫都是全球化的基本因素，而且塑造了新

¹ 雷祺納和波里（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2000）兩人就針對有關全球化的各項議題，蒐編了五十四篇持正反不同看法的論文。

² 有關各家各派對全球化的論述（看法及觀點），可參考 Guillén (2001)。該文蒐集許多有關全球化的作者、書籍、及論文，並整理分類，值得參考。

的組織形式。不斷擴張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將更多的國家帶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內。民主也成爲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戮力實踐的全球性模式，而且各類的國際性組織針對共同關心事務也承擔了許多及新的責任。但這樣發展的狀態，是不是已經成爲一體的世界社會（國界藩籬已名存實亡），則不無疑問。如果說世界已經成爲單一的地點，不同的制度都只是這個體系下的部分元素，扮演著應有的功能，而且遠近各方的人民也都有共同的了解，認爲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之內，那麼這種主張世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共同文化的樂觀說法，也讓人懷疑。美國「九一一」恐怖份子劫持民用航空飛機撞毀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事件，至少證明了當今世界在文化、宗教的發展上尙未走到全球化的階段。

德國學者貝克（Ulrich Beck, 2000: 19）認爲，討論全球化，應該區別不同的面向（dimensions），包括通訊（溝通）技術、生態、經濟、工作組織、文化和公民社會。不過，在定義上，他認爲有必要區別全球化、全球主義與全球性三者之間的差異。首先，全球主義（globalism）指的是，抱持「世界市場已剷除或取代政治行動」的觀點及看法，也就是，世界市場統治的意識形態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¹的意識形態。其次，全球性（globality）指的是，我們生活在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中已經有好長的一段時間：封閉的空間已經成爲一種幻覺、假象；沒有一個國家（或團體）可以完全與其他國家（或團體）隔絕。第三，全球化則是指，跨國行動者（transnational actors）從權力、取向、認同和網絡等各種面向穿透和侵蝕主權國家的過程（Beck, 2000: 9-11; 貝克, 1999:12-14）。

如果詮釋貝克定義的內涵，那麼以英文文法的說法，全球性是現在完成式，全球化是現在進行式，而全球主義則是未來式。全球性代表著世界社會（不過，貝克所謂的世界，表示差異、多樣性，而社會則意涵沒有整合），也就是「沒有統一的多樣性」，現在地球所發生的任何事已不再僅屬於地方事件。全球化則意味著正在進行空間的擴張、時間的壓縮、以及跨國性網絡和關係的互動交

¹ 所謂新自由主義，即是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其核心概念包括私人企業、自由市場及個人責任。具體的主張是解除管制（deregulation）、（金融和貿易）自由化（liberalization）、民營化（或私有化，privatization）及更緊密的全球性整合（global integration）。有關其概念及理論的簡單介紹，請參考 Heywood (1999)。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可參考 Crotty (2000) 及 Meurs (2000)。

往密切。這種發展的過程正企圖掙脫國家的束縛，使得國家的政治權力被剝奪、侵蝕而式微。而全球主義的核心則為意識形態，視經濟全球化趨勢無法逆轉，不但政治與經濟的界限、區隔消失，而且政治替經濟服務，甚而造成政治（國家權力）日益萎縮或「掏空」（hollowing out，借用 Bob Jessop 的用語）。

儘管鼓吹全球主義思惟的氣焰高漲，貝克基本上主張這種意識形態存在著十項不可忽視的謬誤²，但柯漢和奈依（Keohane and Nye, Jr., 2000）並不認為全球化是完全嶄新的現象。他們特別從互相依賴（以下簡稱互賴，interdependence）的角度，與全球化和全球主義作比較，進一步澄清三者之間許多不同的意義。首先，全球主義（與上述賀爾德等人的全球化定義類似但與貝克的說法不同）則是世界的一種狀態，形成跨洲性互賴的網絡。透過資本、貨品、資訊、概念（想法）、人、力量（forces）、以及環境、生物上的相關物質（如酸雨、病原體）產生相互之間的連繫。而全球化或降低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便是全球主義的擴張或縮小。互賴則是國家間（或是不同國家的行為者之間）相互影響的狀況。因此，全球主義是互賴的一種形式，不過有兩種特性上的差異。第一，全球主義是指連結（connections）的網絡（多層關係），而並非單一層面的連繫（linkages）。因而，美國、日本間經濟或軍事的互賴，說得通，但「美日經濟或軍事的全球主義」則說不通。美日的互賴是當代全球主義的一部分，但並非本身即全球主義。第二，關係網絡（network of relationships）要稱得上「全球性」必須要跨越洲際，而不止是區域網絡而已。但互賴不管是鄰近或距離遙遠都可以產生相互影響。相對地，鄰近地區關

² 這十項謬誤分別是：前面七個屬於「正面」性的全球主義——(1)過於簡化的世界市場形上學（太強調經濟面向，而忽略其他層面）；(2)大肆渲染的自由世界貿易（卻犧牲社會和環保作為代價）；(3)誤解的全球化經濟（經濟只是國際化而已）；(4)上演中的風險誇大（實際是，跨國企業脅迫政府、工會讓步，配合其需求）；(5)陶醉式「去掉政治」的革命（主張經濟主宰一切，政治、科技、文化皆臣服於經濟之下）；(6)線性發展式的迷思（強調世界各國皆加入一個同質性的主題公園，麥當勞世界）；(7)誤導性災難思想的批判（認為大量失業不是危機，也不是災難，而是更大的自由機會）；另外三個則屬於「負面性」的全球主義——(8)保守（黑色）的保護主義（自相矛盾，一方面哀悼價值淪喪，需要政府的捍衛，另一方面卻要無情的摧毀國家）；(9)綠色的保護主義（國家瀕臨絕種，就像自然生態一樣，需要自絕於世界市場之外）；(10)紅色的保護主義（認為馬克思預言正確，全球化是「早就告訴你了」的同義字，所以歡呼「起義、革命」的到來，正邁向社會主義的世界大同）。詳細內容，見 Beck, 2000:117-128; 貝克, 1999:154-169.

係要稱之為全球主義，則顯然不恰當、令人感到奇怪(Keohane and Nye, Jr., 2000: 105)。另外，全球主義並不表示普遍性。至少就全世界而言，今天還有許多人家中沒有電話；超過上百萬的人居住在窮鄉僻壤地區，與世界市場、流行的觀念絲毫牽扯不上一點關係。相反地，全球化所伴隨的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在許多層面是日益擴大。全球化不但沒有達到同質化的地步，更不用說平等了。

全球主義促成了三方面的變化：網絡的密度 (the density of networks) 加深、制度 (變化) 的速度 (institutional velocity) 加快、以及跨國的參與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 加大 (Keohane and Nye, Jr., 2000: 108)。但是否這種發展一帆風順，則有待進一步釐清。首先，各種不同網絡之間的關係大大提昇，彼此間有更多的連繫。不過，這並非新鮮事。如果從負面的角度說明，一九二〇年代末的經濟大恐慌，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 (危機) 都顯示了網絡關係的密切，但造成的影響則是負面的，牽一髮動全身。科學中的「混沌」(chaos) 理論，也有類似的說法：「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 「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某地的小小事件會造成催化性的效果，例如，「今天北京一隻蝴蝶展翅翩躚對空氣造成擾動，可能觸發下個月紐約的暴風雨」(葛雷易克，1995: 13)。可是，這也突顯出全球主義帶來的普遍 (蔓延式) 的不確定性，以及往後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其次，資訊革命是全球主義全面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不過，這種變化常被誤解為資訊流動的加速。而真正關鍵則在於通訊成本的降低。³其實，溝通速度又可區分為「訊息速度」(message velocity) 和「制度速度」(institutional velocity)。訊息速度，對先進富裕國家的人民而言，變化不算太大，因為自從電報及電話發明之後，十九世紀末這些地區的電話就已經非常普遍了。而個人溝通在速度的進展上並不多，即使網際網路 (internet) 的電子通訊也沒有比電話連絡要來得更快。相對地，制度速度 (指的是體系和其內部單位的變化程度) 則受到連繫強度 (the intensity of contract) 的影響。譬如，過去 (一九七

³溝通成本的降低，固然縮短了距離，但並非從此距離已完全消失。例如，世界仍有許多落後地區的人民很少或不曾與他國連繫；有形的物品仍受距離的限制，像是汽車、農作物，必須要運輸才能送達到別的地區；而且環境的污染則仍然大部分屬於地區性的。見 Keohane and Nye Jr., 2000: 110-111.

○年代末)，看晚間電視新聞可以了解當日重要大事，而得知更詳細的內容則要看次日報紙的報導與分析。如今（自一九八〇起），有線電視二十四小時全天報導新聞，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新聞循環的週期無形中縮短許多。每小時的頭條新聞幾乎不斷翻新，在在顯示了有線電視網絡在關鍵性的差異上競爭激烈，而且無形中更加快了「訊息速度」。因此，制度速度不僅反映個人的連繫而且強化網絡間的連繫，進而形成了網絡中的網絡。這種現象也才是全球化真正改變的結果。

第三，溝通（通訊）成本的遽降促進了參與者的增加，使得「複雜的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日形加重。這也有三項特徵：（1）參與者眾多和溝通管道多重；（2）議題繁多；及（3）國家間武力的使用及威脅式微。即使關係加深，但複雜的互賴並不表示已增進和諧。就軍事而言，先進民主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間的武力威脅似乎消失。但台灣海峽、伊拉克、科威特、前南斯拉夫（波士尼亞、科索渥）、喀什米爾、剛果等地的衝突仍在，而非洲國家的內戰也層出不窮。不過，複雜的互賴因媒體及國際性組織的發展，促進了社會間接觸管道的擴張。例如，非政府性國際組織（NGOs）到一九九〇年代已經超過二萬六千個。因而，關係著各個社會的議題也相對增多，甚而原專屬於國家政府管轄範圍的事物也變成國際化（如毒品、犯罪等等）。

不過，柯漢和奈依認為，跨國性的參與和複雜性互賴的形成並不表示政治已經終結。相反地，政治仍維持其重要性，因為從政治的角度才真正能看出，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在互相依賴上的不均衡（Keohane and Nye, Jr., 2000: 117）。不僅國家間如此，個別行為者（如跨國公司）亦然，而且常常是透過跨國性政府的關係而造成的。總之，一方面，從變化的角度，全球主義及全球化並不是全面性、一致的，必須視區域、地方及議題而定；但另一方面，互賴關係的加深及複雜，更需要從政治的角度剖析世界性（全球性）問題癥結所在，並進而以政治的方式建立解決衝突的機制。

三、自我調節的全球金融市場？

如果從軍事、環境、社會及文化等角度看全球化，答案可能不是非常明確。那麼全球金融市場呢？一般而言，金融全球化使距離似乎變得沒有意義：全球性股市的交易已經達到無遠弗屆的地步。不過，諷刺的是，金融危機（而且是一連串）也似乎無法倖免。以一九九〇年代為例，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西歐國家匯率的脫序竄升、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墨西哥的銀行、貨幣危機、一九九七和一九九八的亞洲金融風暴、一九九八俄羅斯的股市危機、拉丁美洲國家遭受波及。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放任金融市場自由運作？金融市場會自我調節而不需干涉插手？還是金融體系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穩定性？先天性的脆弱性（fragility）？容易導致金融危機？各國是否有必要協調、尋求解決之道，以維持一個穩定金融體制？

就國內市場而言，如果市場突然景氣（boom），股市呈現樂觀氣象，預測金融資產高漲的心理自然而生，抱持損失風險的謹慎心態也一掃而空，進而吸引大量資金投注、炒作。因為預期獲利豐富，投注資金中不乏許多是靠借貸（尤其是短期借貸）而來，希望獲利大於借貸最後仍能全身而退。由於大量投資（走短線）的結果，有價證券流動資產的獲利率也相對降低。而投資的借貸者短期內獲利未能支付借貸利息，自然必須擴張其信用貸款（也就是借得更多）。再加上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因素發酵，出口市場競爭激烈。如果貨幣匯率緊盯美元，隨其浮動而調整，美元升值時國內貨幣也隨之升值，出口貨品的價格也相對提高，則競爭力大為降低，出口自然不佳，賺取外匯的機會及金額減少，償付借貸能力也因而大減。在以上這些因素的互相影響之下，整個金融體系就變得非常脆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造成極大的震撼。

例如，泰國最大金融公司，第一金融（Finance One），於一九九七年春天面臨財務困境，而泰國銀行（Bank of Thailand）又拒絕替其擔保（bail out）以化解危機。再加上，五月份市場謠言繪聲繪影，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將提高利率（因為擔心日本經濟強勁復甦）。雖然最後證實謠言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但恐慌心理已經造成，導致大量資金外流、呈現一片瀰漫撤資現象。泰國政府鑑於資金出走（capital outflows），不得不宣布泰銖貶值。國際投資者

評估其他東南亞國家可能面臨相同情況，亦爭先恐後撤資。其他東南亞國家隨後也放棄匯率緊盯美元政策，相繼地，這些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利率攀升直上。而國內的借貸者面臨這種情勢，壓力徒增，因為其借貸是以美元為基準。為了及早償付借貸，紛紛出售本國貨幣換取美元。這種大量拋售本國貨幣的結果，進而促成本國貨幣的再度貶值。從此惡性循環出現，本國貨幣貶值又加重借貸者的負擔，只得再拋售本國貨幣，接著貨幣再貶值、。最後一發不可收拾，金融風暴就是這麼產生的（Wolfson, 2000: 371-378）。所以，學者敏斯基（Hyman P. Minsky: 1977: 142; 引自 Wolfson, 2000: 371）認為：「金融脆弱性是金融體系中的一個屬性。在脆弱的金融體系中，連續正常性的運作，可能受到並非不尋常事件的影響而瓦解」。

從國際的角度，當國際資本流入某國市場時，一方面表示國際投資者對該國市場充分具有信心（投資可預期獲利），但另一方面則潛伏著金融脆弱性的增加（一旦投資報酬率低於預期獲利率，或投資信心喪失，則撤資效應隨即將至）。其次，外資進入本國市場造成的效果是國內資產價格將提高。因此，外國投資者的興趣是對本國股票和債券市場中的有價證券投資，以及賭注性地對房地產市場增加投資（預期房地產市場價格將水漲船高）。再者，國際市場上貨品的充斥、過盛，而出現獲利率問題（即降低）及貿易赤字。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展望製造品增加出口的可能性已然降低，因而刺激金融投資的利率上揚，進而促成新一波資產價格的高漲。第四，當國內市場出現危機時，投資者恐慌，儘量脫手在當地已投資的有價證券，不但不再借貸給當地國家，而且出售該國貨幣，造成該國貨幣面臨貶值的壓力。因而，「傳染性」效果（“contagion” effect）擴散至其他鄰近地區及國家。第五，一旦貨幣貶值急轉直下，政府不得不採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壓抑國內需求。這種作法的目的無非是控制通貨膨脹、減少進口、並企圖恢復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如果基本目的是在克服並渡過收支平衡的危機，那麼這樣的方式或許有效。但問題的癥結點則是金融危機的浮現，如此時採用緊縮的手段（提高利率並壓制需求）則無異火上加油，反而惡化了想要救亡圖存的借貸公司本身的困境。最後，在一切方法失效、失靈之後，只有求助於「最後依靠的貸方」（lender of last resort）——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IMF），接受其條件融資、著手進行改善，以化解目前金融體系的危機（Wolfson, 2000: 374-375）。

事實上，國際金融體系，就像所有金融市場一樣，將借貸者和存款者連結起來，而其交易形式則是跨越不同國家並牽涉不同的貨幣。由於金融仲介者不易取得相關方面的資訊（例如，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外國企業的實際操作、各國間匯率的兌換狀況），因此國際金融交易可能承擔相當程度上不確定的風險。尤其，匯率的變動大、資本的流動快，均使得國際投資者（銀行、共同基金、個人）可能瞬間因投機或判斷錯誤而損失慘重。當某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國際投資者又陷於泥淖、無法脫身時，一種期待的心理自然而生，那就是，國際組織或先進國家會及時伸出援手、化解困境。例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當墨西哥金融危機出現時，美國財政部立即採取行動，提供數百億美元援助，企圖穩定墨西哥批索。不過，當俄羅斯於一九九八年夏天面臨相同狀況，無力償還一千二百億美元外債及四百億美元國內債務時，國際間的援手又似乎裹足不前。也因而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遭受牽連、股市重挫。這就涉及了所謂的「道德冒險」（moral hazard）問題：是否每逢金融危機出現時，國際金融組織或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就必須插手干涉，成為「最後依靠的貸方」？

雖然「道德冒險」或「最後依靠的貸方」等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尚無定論，而且對於國際性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巴塞爾銀行督導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f Bank Supervisors）〔基地設於瑞士巴塞爾（Basel, Switzerland）的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中〕，在功能及執行上也有兩極的看法⁴，但肯定的事實是，國際金融體系沒有辦法自我調節、也不能自行運作順暢。因此，金融全球化的結果有如脫韁的野馬，一方面無法控制（贊成全球化者也主張沒有必要任其自由發展），但另一方面為避免釀成災難、危機，則需要適時的管理與挽救（此時政治就無法避免）。此外，如何尋求一個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開布斯坦（Ethan Kapstein）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

⁴ 例如，米克里斯維及屋爾椎智（Micklethwait and Wooldridge, 2001: 24）認為 WTO（為仲裁機制）及 IMF（危機管理機構）並非為紙老虎、仍有其一定功能，但各國政府在國際秩序上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不過，美國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前財政部長西蒙（William Simon）及花旗銀行總裁瑞士頓（Walter Wriston）均認為 IMF 這個組織「沒有效果、沒有必要、及過時」。見 Kapstein (1998: 358-359)。

第一，必須建立一個穩固、規範齊全的銀行體系。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密切。市場需要主導的國家建立法治，不但能夠制定而且能夠執行有關相關法律方面的規定。換句話說，如果缺乏完善的政府體制，則政府或市場，在人民及消費者的眼中看來，就不再具有正當性。第二，重新回到全球經濟的基本管理原則，保證所有參與者都能確實遵守。換言之，遊戲規則必須確立，包括：任何遵守「巴塞爾銀行督導委員會」所立規定標準的銀行或公司，才能獲得貸款或允許從事金融活動；投資者只有在那些接受監督的股市才可進行投資，如果有任何不遵守國際會計標準的公司，則不得對其投資；任何不遵守 IMF 規定的國家，如果單方面自行貶值其貨幣、不履行債務，而且如果沒事先與 IMF 事先諮商，則不得自 IMF 處取得貸款（Kapstein, 1998: 359-360）。

總之，開布斯坦認為，世界經濟必須要有規則，而且所有參與者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如此才能確保全球的穩定和公平。不過，任何規則要能確立並奉行不渝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制裁力。違反或不遵守規則的結果或下場，就是接受制裁。倘若制裁不力，效果不彰，又如何能落實遵守規則呢？誰又會聽命於這些白紙黑字呢？因此，全球金融體系最後還是必須要依賴政治力量的操作。至於成功與否則另當別論。

四、「新」經濟已經到來？

隨著科技不斷地創新，莫爾法則（Moore's Law）——以英特爾（Intel）公司的共同創辦人戈登·莫爾（Gordon Moore）為名——也似乎應驗：大約每十八個月矽晶片的密度將擴大一倍（對消費者而言，矽晶片電路〔silicon circuits〕的成本則減少一半）。而網際網路的發展及開拓，不但資訊的交流與溝通迅速，並且無論採購或銷售，線上交易、電子商務、或網路經濟已經成為可能，市場也變為愈來愈虛擬化⁵。同時，「新經濟」到來的願景（vision）也

⁵ 大前研一可以說是鼓吹「新」經濟或「網路經濟」最不遺餘力的日本作家了。見大前研一（2000）。

變得可能：由於在技術創新（日新月異）、學習曲線（縮短）、規模經濟（擴大）、「網絡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擴散）及「關鍵突破點 tipping point」（加速）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企業的生產成本將呈現永無止境地降低。因而，新經濟與舊經濟在三點上有所不同：第一，舊經濟是貨品售賣價格比成本要高以便賺取利潤；新經濟是售賣價格要比成本還低（仰賴學習曲線次年時降低成本）。第二，舊經濟是公司股價增值在於銷售有價值的商品給消費者；新經濟則是贈送產品給消費者（如網路流覽軟體：網景或微軟的探險家）以提昇公司股價，並期待一旦消費者習慣使用公司產品後，則靠著網絡外部性的效果，次年新產品上市時則改以販賣方式並提高價格。第三，舊經濟是最新開發市場者（即第一位進入新的市場）常常未瞭解狀況而犯大錯，而跟隨其後者則學習及領悟前車之鑑，並避免重蹈覆轍。因而，第一位進入者在舊經濟裡則是非常危險的；至於新經濟則是第一位通過市場關鍵突破點者將在市場上處於不可能被擊敗的地位、享受市場的大餅（De Long, 1998: 16）。這些新經濟景象在現實生活中也明顯可見。譬如：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視窗軟體（Windows）突破瓶頸，通過關鍵突破點而打敗蘋果電腦；矽晶片價格有如流星般地直落而下；美國華爾街許多新公司，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其成長的軌道則有如火箭般地快速上昇；居晶片業先鋒地位的英特爾公司，三十年前根本名不見經傳，當今卻是如此地叱吒風雲⁶。

其實，上述所謂的新經濟，祇不過是標準的經濟動態（standard economic dynamics）中領導部門（leading sector）罷了（也就是，任何動態性經濟都具有這種特色），在整個經濟中只是個小部份產業而已。今天美國的矽谷（Silicon Valley）與一八三〇年代英國的曼徹斯特，均為居領導部門的中心地點。而且每個領導部門都經歷類似的過程。例如，美國汽車業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價格不斷下降，即使現在的車價平均要比十年前便宜四分之一。另外，半導體創新的速度十年以來價值已增高了三十二倍。但這只限於半導體產業而言，其他相關零件的改進速度仍跟不上，導致微電子產品（microelectronics products）的價格降幅不多。因此，持「新經濟來臨」樂觀論點的人士，可能必須從歷史的角度考慮以下幾個問題。首先，是否領導部門（如現在的微電子業）在經歷快

⁶ 有關英特爾的發跡史，可參考傑克遜（Jackson, 1999）。

速技術進步的「光榮」時刻後會走到終點？歷史上，裝配線上生產的福特汽車（發展新車模型）、英國電纜及無線公司的海底電纜（不受海水腐蝕）、抗生素盤尼西林的發明（新的抗生素也相繼發現）等例子，均顯示其產業領導部門最後將發展為（技術）成熟產業（*mature industry*）。因此，以下的情況不無可能：當今的電腦和通訊發展為成熟產業後，其他新興產業將取而代之成為領導部門。

其次，領導部門在變為成熟產業前（即處於光榮時刻），是否生產力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必然發生？過去的鐵路、汽車、航空、電視、傳播、視覺音響等都有過輝煌、革命性的發展。如今，半導體、電腦、電訊等產業正如日中天的發達，生產力的大步提昇本是領導部門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而已。所以，抱持過度樂觀心理，認為目前這種繁榮景氣持續不墜，大可不必。就像是看到一千元大鈔掉在路邊一樣，那可能是個假象而已（真實的情形不能說無，但機率微乎其微），因為如果真的是一千元大鈔，早就有人撿走了，還會等到你嗎？期待電子科技未來出現一片榮景，就如期盼路邊有許多千元大鈔一樣，是不太可能的（*De Long, 1998: 18-19*）。

第三，領導部門在光榮時刻過後，競爭的形式是否發生變化？的確，在光榮階段，技術是唯一的趨動力。但其後，如何掌握消費者想要的商品形式並能真正地呈現在他們面前，則是業界競爭的關鍵所在。過去，福特汽車獨佔鰲頭、獨領風騷時，本可提供消費者任何款式、顏色的汽車，繼續獨霸。當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不但在汽車生產上保持規模經濟的優點外，更提供消費者許多選擇（包括汽車種類、模型、款式及顏色）時，兩家之間的競爭正式進入戰國時代。同樣地，今天的電腦業及網際網路業並不清楚消費者需要什麼，只是看微軟稱霸，但可見的將來一定會有新的競爭者提供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必然在資訊時代產生很大的漣漪與競爭。

第四，領導部門的技術革命就等於經濟革命嗎？過去的經驗顯示，技術革命提供我們無法想像的能力。例如，鐵路的拓展使我們到達遠地的能力加強：省力及時間縮短。不過，技術革命並不等於經濟革命。微電子技術革命固然提昇我們處理資訊過程的能力，但這並不表示其將主宰經濟。事實上，所謂的經濟是把焦點放在貴重的商品上而非更便宜的產品。一旦令人興奮的新產品已經被擠壓成所費不多的便宜貨時，經濟的能量將會轉移到其他方向上。因此，當

我們的能力增加時，這種擴大能力對經濟的顯著性並沒有增加，因為經濟本質所關心的是「有價值且稀少」的事物（奇貨可居，自然價格上升），而不是物美價廉的物品（De Long, 1998: 19-20）。

另外，就財產權角度和史密斯的市場（「一隻看不見的手」）概念而言，商品必須滿足三個基本要件：（1）排他（*excludable*）：擁有者可以輕易並方便地禁止別人使用自己的東西，除非獲得本人的同意；（2）獨享（*rival*）：我現在使用，你就不能用；（3）透明（*transparent*）：購買者知道所採購的東西是什麼。但如果產品不符合以上三個條件怎麼辦？第一，如果物品不具排他性：使用別人東西而不用付費，那麼雙方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商業關係（買者與賣者的關係），而是交換禮品的參與者關係（不能要求對方償付費用，只能盼望對方回報）。就像公共電視台的情形一樣，雖然播放的節目都具有教育意義或知識性，而且觀眾的評價也很高，但一旦鼓勵大家捐款、籌措財源時，則效果不彰（搭便車的心理作祟：就算他不捐款也無法禁止其收看節目）。第二：如果商品沒有獨享性：那麼市場無法正確訂定價格。就像電腦軟體或其他資訊產品一樣，我能使用但並不能防止你也使用，那麼對這個產品而言，大家就會產生一種感覺，它的價格應等於零。可是沒有一家製造商願意把產品定價為零的（等於免費贈送）。只有那些擁有強大市場力的製造商才可能把產品市價提高。因此，在一個商品沒有獨享的世界裡，壟斷或獨賣（*monopoly*）才是常規而不是例外。從這個「非獨享商品」的邏輯來思考，微軟公司的崛起不是沒有原因的：也就是，針對產品非獨享的性質（零價格），只有在市場中建立主宰地位的廠家才能夠改變價格並賺取優渥利潤。如果不能達到獨霸的地步，那麼商機急轉直下、造成惡性循環的效果：售貨量低、運銷成本高、而且撰寫軟體的成本又免不了，若這種情形持續下去，則沒有多久，就會破產、倒閉，在市場中銷聲匿跡。第三，如果貨品不透明：市場就不算完全。消費者不知道產品的內容、細節為何，售貨員也不清楚貨品的價值是什麼，導致市場根本就無法運作。有趣的是，資訊產品具有高度的不透明性：許多資訊產品的特性是，買了它可以學習或是了解一些新的事務，因此，你並不清楚地知道你買的是什麼或你會多麼地喜歡上它，只有在用了它之後，可是那時候已拆封，想退也來不及了（De Long, 1998: 24-25）。

想要「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經濟能發揮功效，商品必須滿足排他、獨

享、透明等三個條件。可是，如前所述，資訊產品在定義上就是不透明（如果你已經知道資訊的內容時，你還會買它嗎？），軟體也不具透明性（如果第一次購買了微軟的 Windows 或 Word 軟體，你知不知道你將來會受制於它？甚至還要再掏腰包，升級或修改程式？如果你只有 Windows 95，你能讀 Windows 98 甚至 Windows 2000 的資訊嗎？），而電腦化的字、影像、或程式更是如此（一份檔案絕對不會告訴你它是第幾次被取得，第一次、第二次或上千次？）。明顯的是，如果未來走向知識經濟的時代，那麼企業想要獲得市場的壟斷，就會愈來愈不按照市場經濟中貨品的特性生產商品。而最成功的企業，將不會是那些製造更好產品的廠家，而是那些集努力之大成、誘導消費者的廠商——誘導他們使用產品，然後付費。當然，有些企業或公司會採取不同的策略以賺取暴利，那就是，打官司控告對方侵犯智慧財產權（從軟體到音樂、電影光碟）（De Long, 1998: 25-26）。如果真的到了那個時候，那麼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檢調單位及法院）的責任及工作不但不會減輕，而且政府扮演的角色將會更吃重。換言之，新經濟更需要政治，雖然目前尚未達到那個地步、境界。

五、經濟能脫離政治？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羅伊（Theodore J. Lewi）認為，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政治科學在界定目標的鬥爭上已敗給了新的霸權典範，經濟的民主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主張自由企業本身足以完成所有其他目標。它的信譽一方面是來自於經濟科學，另一方面則是軼事性的證據，證明了資本主義已征服威權主義。但羅伊不認為這個「經濟的民主論」屬於經濟科學，反而是個令我們感到害怕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忽略了或隱藏那些矛盾及不能支持論點的證據。事實上，所謂的自由市場對那些進入的個人、組織或團體並不是自由（免費）的（也就是，並不是所有想要進入市場的個人、組織或團體都可自由進入），而且自由市場，如果沒有國家實質上的支持，是不可能興盛或繁榮的。但是過去二十年來，一股污穢、醜化國家的強勢力量已逐漸成形，其聲稱不理性的主要來源正是國家（或政治），因而「去政治化」或「去國家化」

才是經濟欣欣向榮的基礎點 (Lowi, 2001: 132)。

同時，經濟乃被設想為內部充滿動態性的體系，也是個封閉、自我創造和自行達到完美的體系。因此，景氣循環 (business cycles) 可以說是內部機制 (inner mechanism) 運作下的結果，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而生生不息。不但亞當·史密斯「一隻看不見的手」讓人可以理解，而且「一隻看得見的手」(“a visible hand”) 更表露無遺 (景氣現象反映在經驗世界裡)。而均衡 (equilibrium) 概念則是凸顯出市場有自我調節的功能：經過許多 (多到幾乎數不清) 消費者及供給商彼此互動影響下，價格不斷地調整，最後達到一個有效價格 (efficiency price)，即均衡價格，使得資源在製造產品上既不會出現浪費 (導致價格太低) 也不會過於短缺 (價格太高)。然而，世界有史以來獲利最豐的投資管理者索羅斯 (George Soros) 則說：「均衡概念非常有用，但也可能騙人。它聽起來有點經驗事實的味道，但並非如此。均衡很少在真實生活中看到，市場價格有波動的壞習慣」(Soros, 1998: 36; 索羅斯, 1998: 39)。索羅斯更進一步提到：「市場基本教義 (market fundamentalism) 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所創造的意識形態，不但刺激最成功的參與者 (奉行不諱)，同時也引導著政策 (走向)」(Soros, 1998: 128; 索羅斯, 1998: 130)。就在這種「經濟觀念加上意識形態」強大力量影響下，政治及國家似乎毫無招架之力，已經撤退並萎縮成邊緣地位。

但真的如此嗎？換個方式說，如果經濟全球化代表的是快速的技術進步、大規模的資本流動、擴大中的國際貿易，那麼是不是這意味著「政治」已經開始式微或準備進入銷聲匿跡的時代？要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探討，即宏觀面 (macro)、中間層面 (meso) 及微觀面 (micro)。首先，無庸置疑的是，國際貿易的程度已經接近「無國界」地步，金融市場交易 (特別是國際金融或資本交易) 的數量每年以兆億美元單位計算，而且流通範圍除先進民主國家外也已擴大到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包括原東歐共產國家。但這種總體面經濟的運作 (近似於「發揮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體系」)，如果沒有制度性結構的輔助是無法奏效的。例如，本文第三節所述的 IMF、World Bank 及 WTO 皆發揮了組織性架構的功能。從二次大戰後的固定匯率到一九七〇年代初的浮動匯率期間，IMF 的角色不可磨滅，並且現在仍繼續以「最後依靠的貸方」身份來維持世界經濟的穩定。同時，對那些因戰亂而分崩離析的國家及新興開

發中國家，IMF 與 World Bank 也都適時伸出援手，幫助其解決困境。另外，IMF、World Bank 及 WTO 也不遺餘力地防範各區域性自由貿易組織（集團），避免因利害衝突而發生彼此敵對或惡性競爭的不良結果。至於落後國家及前東歐集團國家，這三個國際組織不但儘可能利用借貸關係或其他方式助其紓困，並指導其經濟改革方向。從這個觀點而言，總體市場體系的擴展，既不是純經濟的，也不是自然（自動或自發）的，而是必須加上政治，稱之為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其次，中間層面指的是，全球經濟中的主要競賽者、重要貿易者和交易者。從交換的角度，理性行為者最原始的形態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為追求財富、滿足、幸福而相互交換彼此所需的東西或事物。隨著社會的複雜及貨幣的產生，專業的貿易商（*specialized traders*）出現了，他們把交換當職業，不但為的是謀生甚而希望致富。因而，這些專業及職業的商人、發貨人、批發商把交換關係延伸擴展，就像長鏈條一樣，連繫遠近各地。此時，主要的行為者已變為商家（*firm*）。之後，商業性企業（*business enterprise*）興起並進一步改變交換體系。這類商人購買或雇用「投入」（*inputs*），組織生產過程，然後再售出成品和勞務。他們所處理的主要是人（工人、雇傭）和其他資源：組織人們完成工作。這些人稱之為企業家，把正式的組織引入了市場（*Lindblom, 1977: 35-37*）。企業家所創造的組織便稱之為公司（*corporation*）——或稱為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它們在法律上具有人的地位（法人），甚而比正常人的生命更長，成為永久的人（*the eternal person*）。

此時，公司已成為維持市場運作及交易過程中唯一的引擎。而公司之所以在市場中居於主宰地位的原因是，其有能力內部化（*internalize*）生產和分配的過程、提昇公司內部相關單位間行政方面的協商、並能完成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資本集中、和市場組織及管理的目的。這樣一來，公司在國際（或全球）經濟的供需調整上不可或缺，也就是說，公司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競賽者、重要貿易者和交易者。不過，公司（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現在比過去小型（及簡單）交換市場中的個人和小商店，更需要依靠國家（政府）所提供的架構（或「功能性的必要條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s*），進行市場交易。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或架構，市場及公司是無法運作的，更談不上「一隻看不見的手」。這些條件包括：（1）法律和秩序的維護——有規則可循，就像紅綠燈

一樣，可預測性高；(2)財產的確保——保障私有財產，禁止非法侵佔或竊取；(3)契約訂定及執行的有效——保證交易是按照契約內容執行，否則法律將予以制裁；(4)交換的進行——契約內容要落實，使用的語言必須標準化，包括法律語言及專門性、技術性語言；(5)公共財的提供——解決市場本身無法克服的困境，亦即「搭便車」(free riders)的問題；(6)權利及責任歸屬的規定——公司股東權利受法律保障，而有關責任及義務也有法律方面的規定，侵權行為法 (the tort law) 即是範例，禁止民事非法行為 (Lowi, 2001: 134-135)。

上述架構或必要條件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所不可缺少的，但高談自由市場的人士卻避而不談這些基本要素及條件，導致普遍大眾誤解了經濟市場的運作，以為市場就是沒有政治的「干涉」(表面上好像如此，但市場必須要有政治的「鋪路」)。所以，羅伊教授評論道：「在經濟競賽者的現實世界裡，沒有經濟這樣的東西，只有政治經濟」[(In the real world of economic player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economy. There is only *political* economy.)] (Lowi, 2001: 135)。同時，所有市場經濟的「功能性必要條件」也由深思熟慮、制度化的政府活動全部(或很大部分)予以配合，包括法律、公共政策、計畫、法令、和其他官方工具。因此，所有公司，不管大小或是否具有多國性質，在其所座落的地點上一定享有法人資格並受當地公共政策或法律之保護 (Lowi, 2001: 135)。

最後，微觀面指的是社區或地方制度層面。經濟全球化必然對地方造成衝擊及影響。所有經濟活動不可能像海市蜃樓般地畫餅充飢，一定要有空間地點做為進行交易的根據地(不論是生產、分配、投資、計畫、協調)。即使金融交易使得金錢、貨幣虛擬化(或稱為「金錢之死」⁷)，但仍然需要運籌帷幄的基地，像倫敦、紐約(甚至用華爾街代表)、東京等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進行股市交易。雖然資本具有跨越時空的特性，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尋對其最為有利(包括稅基、勞力成本、原料、研究發展、一流人才等)的地點，甚而以「資本罷工」(capital strike)威脅的方式與中央、區域或地方政府談判，但最後仍必須「塵埃落定」定居下來。不管是由中央(聯邦)或由州(邦、省、縣、市)政府來負責安排相關事宜，執行及實施最後仍是地方或地方化。所以，

⁷ 見考茨曼(1995)《金錢之死》一書。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歐尼爾（Thomas P. “Tip” O’Neill, Jr.）說過：「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All politics is local.”）。而羅伊教授則提出補充解釋：「因為所有的社會控制都是地方」（“because all social control is local.”）（Lowi, 2001: 136）。

總之，經濟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就國際的角度而言，如果「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是經濟自由化的目標或是經濟全球化的理想，那麼國際性組織如 WTO 或 EU（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只要在政策上以一頁的篇幅規定「取消所有關稅及非關稅障礙」，並要求各國盡義務及責任地「按表操作」即可。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自由貿易條約往往超過數百頁，甚而烏拉圭談判結束，由 WTO 取代 GATT，其議定協議書內容則超過五千頁。為什麼？道理不難了解：情況太多，必須詳加說明。另外，從參與者的角度而言，公司法人要想在世界各地競爭、擴大、獲利，沒有「遊戲規則」是無法運作的。而這些規則或必要條件如果沒有政治就根本無法落實。最後，從微觀的角度而言，企業不管到那裡去，經濟操作必須要在地方上生根。可是，地方並不是無人荒島，企業勢必要與地方上的文化、人情、傳統、習慣、制度配合。結果，經濟依然要靠政治來維繫。

六、經濟全球化與國家⁸

雖然經濟脫離不了政治，但全球化與國家的關係為何？許多觀察家認為，全球化已日漸腐蝕了國家，不僅國家在謀求社會及經濟福利上所能控制的資源已經萎縮，而且政府的正當性和權威在民眾眼裡也大不如從前。過去的二十年裡，幾乎所有先進工業國家的百姓們對他們中央政府的信心降低許多。由於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破壞了國家對資訊流通的控制，也因而減弱了政府影響民眾的能力。另外，媒體國際化造成的效果、美國大眾文化的普遍流行世界各地、以

⁸ 嚴格講，國家與政府不同。由於本文不在強調兩者不同，而且為了避免使用同一語詞次數太多，因此下文將兩者視為同義，交替使用。

及資訊的解除管制，這些因素混合的結果造成了國家傳統及價值的沒落，並乾涸了人民支持國家行動的泉源。同時，國際經濟的迅速變化，導致政治領袖們覺得有強烈的無力感，一方面無法在增進國家財富上居於主導力量，另一方面很難在保障人民福祉上獲得人民的認同及共識。

其實，政府面對全球經濟有其結構上的限制。資本流動性高而勞工相對地流動性低，使得政府不得不因應資本家的利益與要求，否則產業外移、勞工失業。如果任何社會的賦稅、工業政策、環境衛生規定、或工業關係成本過高或限制太多，那麼投資者會抽身（pull up stakes）將資金轉往他處去。但勞工卻不同，不是那麼容易地說走就走。在這種情形下，對資金減稅的結果便是：（1）勞工必須承擔大部分的稅負；（2）政府負擔社會福利支出的能力大為降低；（3）政府能使用的工具（即政策）所施展的空間和範圍也相對減少。另一方面，受到市場衝擊的團體（主要是傳統技術勞工）則強求國家能有效解決及補償他們生活上的困頓。因而，不管是左派或右派政府，在面臨失去國家競爭力或失去投資者興趣的重大挑戰下，都可能必須採取相同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以爲因應（Berger, 2000:50-51）。

然而，國家真的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已經失去了總體經濟的主權嗎？部分學者如羅綴克（Rodrik, 1997: 62-64）認爲如此，政府對資金抽稅的能力降低或減少。但根據實證資料顯示，貿易開放和資本流動並沒有降低政府徵稅的能力，甚至政府還擴大累進稅制（Garrett, 1998: 85-89）。學者蓋瑞（Garrett, 1998）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和社會在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公共性投資（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及重新分配的支出（化解社會各行各業因經濟因素而流離失所的緊張與衝突），企業獲得許多實質好處。所以，只要所在環境提供了價值匪淺的公共財（例如，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社會穩定、及接近優勢的研究機構地點），即使擁有移動資產（即資本）的所有人（包括企業）也仍然會居留高課稅的社會及國家中。

其次，國家是否黔驢技窮在產業政策上無法保護國內產業？在過去，無論先進工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都有相當多的手段和政策鼓勵某些特別的產業，譬如，優惠信用貸款（preferential credit）、出口補助、研發贊助、軍事購買、保護國內市場提供國內製造商行銷等等。但隨著資本流動的可能性增加，如果投資海外比投資國內的報酬率要高的話，那麼政府限制國內投資者僅投資國內就

有困難。如果產品的生產鏈 (commodity chains) 打破了國界的限制 (也就是, 國內與海外互相支援零件的供給和生產), 則原來國內製造商和國內零售商互相依賴的態勢將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又如果全球性供應商能隨時供給跨國企業所需要的服務及半成品, 那麼不但國內供應商受到排擠, 而且跨國公司也不再需要與當地製造商合作甚至技術轉移 (Berger, 2000: 54-55)。在這些情況下, 似乎政府的干預沒有多大的效果。不過, 有趣的是, 以上可能性僅止於理論的邏輯思維而已, 因為第一, 國際間爭議不休, 在 WTO 的架構下試圖給予外商平等待遇的條約尚未訂立, 第二, 各國國內的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和社會運動均強力反對這種類似一律平等的政策。換句話說, 政府在目前仍有發揮空間進行實質性國內產業保護政策。

再者, 是否因為國家競爭力的緣故福利國家已經終結? 從實證的角度而言, 這種悲觀的論點有些言過其實。首先, 先進國家中公司營業稅佔政府總稅收或佔國內總生產毛額的比率一直維持穩定的情況。其次, 各國社會性支出的形態改變有很大的差異。然而, 根據一項研究十五個先進國家的報告, 資本流動對總社會支出的影響要看以下的條件: 如果 (1) 集體利益代表的制度穩固、(2) 權威集中、(3) 福利國家的原則是基於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那麼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微乎其微, 或者說, 它們的效應是正面的, 即成功地捍衛福利國家以抵抗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Berger, 2000: 55-56)。

維斯 (Weiss) 在《無力國家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1998) 一書中強調, 國家「轉變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 在因應外在環境上是個關鍵。她所謂的「轉變能力」指的是: 「協調產業變遷以迎合變化中國際競爭的能力」(1998: 7)。維斯的研究發現, 轉變能力特別在「管理下的互賴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環境中最能發揮與成功。而「管理下的互賴」則是: 正式制度化的合作環境, 其中強勢政府和組織完善的企業充分合作。處在這種環境下產業轉型要比政府單方面制定政策來得好。從維斯的討論裡我們可以得知, 全球化與國家能力息息相關, 而且全球化並不是侵蝕國家的主要破壞因素, 反而是促使其發展能力作為國際競爭的重要資產。因此, 一方面, 如何發展出適當的「轉變能力」將是各國政府未來的課題, 而另一方面, 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的真正關鍵則是政治。

事實上, 雖然各國公民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對自己本國政治領導人物

喪失信心並持不信任的態度，但當國際經濟的壓力侵犯到國內社會時，人民則會更迫切地尋求自己政府的幫助與解救，希望針對沒有規範及約束的資金、勞工、和資訊（導致失業、產業沒落、外來移民、色情網站）政府能予以保護。諷刺的是，許多公民把這些新情況看作是自己政府所創造出來的結果，包括開放旅遊、市場、國界；訂立新的貿易協定、條約；開放移民、外勞等。因為這些問題的本源是政治，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應該由政府採取行動出面加以解決。同時，弔詭的是，探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及結果不是看全球或全世界，而是重新把焦點放在政治上，放在國家的角色上，以及放在國家的領土疆域內。這也就是未來廿一世紀發展的趨勢和方向——重新回到政治。

七、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幾項初步性的結論。首先，全球化不等於全球性，更不等於全球主義。全球化不但沒有達到同質性的地步，反而造成彼此之間的不對等。另外，「複雜的互賴」似乎更能說明國際間的關係與發展，雖然「複雜的互賴」並不表示和諧已經促成，也不表示政治已經終結。其次，全球金融市場尚未能發揮自我調節的功能，倒是金融危機連續不斷，更突顯出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講座教授梭羅（Thurow, 2000: 168）論道，資本主義有三個與生俱來的弱點：短視近利、經濟衰退、及金融風暴。全球金融市場要能維持運作，不會發生危機，最後還是必須要依靠政治力量，建立「遊戲規則」使所有的參賽者均能遵守。再者，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及開拓，有人稱「新」經濟（即「網路經濟」）已經來臨。雖然「新」經濟與「舊」經濟在售價成本、銷售價格和開發市場上有所不同，但是否可稱為「新」經濟，則不無疑問，最多只能稱之為經濟動態中的領導部門。而網路經濟的產品特性與一般商品又有所不同，已不再具排他、獨享、和透明等性質。如果未來網路經濟真的盛行，則不但政治和政府不得輕鬆，而且更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經濟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無論從國際面、競賽者及地方層次三個角度來看，經濟絲毫無獨立的角色，反而必須依附於政治之下，所以「沒有經濟這樣的東西，只有政治經濟」。第五，雖然經濟全球化使得固若金湯的國家呈現鬆動的跡象，但國家並非一籌莫展、坐以待斃。有趣的是，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危機化為轉機，創造出繁榮的新景象。而更弔詭的是，國家必須自己收拾自己所遺留下來的殘局。換言之，追根究底，造成經濟全球化的是國家，但也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化解一切所帶來的煩惱與困境。因此，終歸還是要回到政治。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在探討政治、國家或政府要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衝擊。就處理這個議題的文獻而言，實在美不勝收。例如，羅綴克（Rodrik）研究全球經濟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他從經濟史回顧中得到的結論是：成功的經濟體發展出「自己商標的國家資本主義」（their own brand of national capitalism）（Rodrik, 1999: 150）。這些經濟成功的國家之所以能刺激成長，是在外來震撼期間實施國內投資策略，並透過社會安全網絡和政治制度（解決政

治爭端)來維持社會穩定。而且這些國家在政策上給我們帶來的啓示非常簡單卻又常被忽略：刺激國內投資；維持社會和平。從這個例子裡，我們可以再回到本文的意涵：談經濟仍免不了觸碰政治。

法國已故思想家傅柯(Foucault)說過一句名言：「權力無所不在，並非它含蓋所有事務，而是因為它來自各處」。如果這句話多少包含著真實意義，而權力是政治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擴大解釋為「政治無所不在」。當然，這種說法可能招致「泛政治化」的譏諷。甚而有人可能批評道，傅柯的理論不見得都對，而且遭受學術界許多的批判。可是想想看「政治不是一切，但一切都是政治」這句話，雖然我們不能證明這句話是對的，但就本文所探討的內容裡，至少它還有點真實存在，不是嗎？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1996。《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大前研一／著，吳玉鈴／譯。2000。《COM 風暴》。台北：藍鯨出版有限公司。
- 布賴恩，洛威爾；黛安娜·法雷爾／著，汪仲／譯。1997。《無疆界市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貝克／著，孫治本／譯。1999。《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考茨曼，卓爾／著，呂錦珍／譯。1995。《金錢之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阿達，雅克／著，何竟，周曉幸／譯。2000。《經濟全球化》。台北：米娜貝爾出版公司。
- 索羅斯，喬治／著，聯合報編譯組／譯。1998。《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梭羅，萊斯特／著，齊思賢／譯。2000。《知識經濟時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華特斯，麥爾肯 (Walters, Malcolm)／著，徐偉傑／譯。2000。《全球化》。台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傑克遜，堤姆／著，陳建成，陳信達／譯。1999。《英特爾三十年風雲》。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葛雷易克／著，林和／譯。1995。《混沌：不測風雲的背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羅斯肯思，理查 (Rosecrance, Richard)／著，李振昌／譯。2000。《虛擬國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英文部分：

- Beck, Ulrich. 2000. *What is Globalization?*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Berger, Suzanne. 2000.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3: 43-62.
- Crotty, James. 2000.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Neoliberal Regim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2 (3): 361-368.
- De Long, J. Bradford. 1998. "What 'New' Economy?" *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4-26.
- Garrett, Geoffrey. 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illén, Mauro F.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27: 235-260.
-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ywood, Andrew. 1999.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apstein, Ethan B. 1998. "Global Rules for Global Financ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355-360.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S. Nye Jr. 2000.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Spring) Issue 118: 104-119.
- Lechner, Frank J. and John Boli. 2000.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Lowi, Theodore J. 2001. "Our Millennium: Po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the Global Corporate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2): 131-150.
- Meurs, Mieke. 2000. "Are Markets Like Mushrooms? and Other Neoliberal Quandr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2 (3): 461-469.

- Micklethwait, John and Adrian Wooldridge. 2001.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Foreign Policy*. Sep/Oct. Issue 126: 16-26.
- Minsky, Hyman P. 197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drik, Dani.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Rodrik, Dani.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 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New York: Perseus Books.
-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New York: Polity Press.
- Wolfson, Martin H. 2000. "Neo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abili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2 (3): 369-378.

Demystifying the Delus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ringing the Politics Back in

Hsing-Chou Sung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eems to be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Howev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 local and politics should be abandoned or given up.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mphasize that there is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economy. There is only political economy." The following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first, the introduction; second, the mea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lated concepts; third,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world financial market has been well-developed and has become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i.e., the Pareto optimality in terms of economic concept; fourth,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new"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ew era of economy; fifth,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sixth, a close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 finally,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olitics, the financial market, new economy, the state.